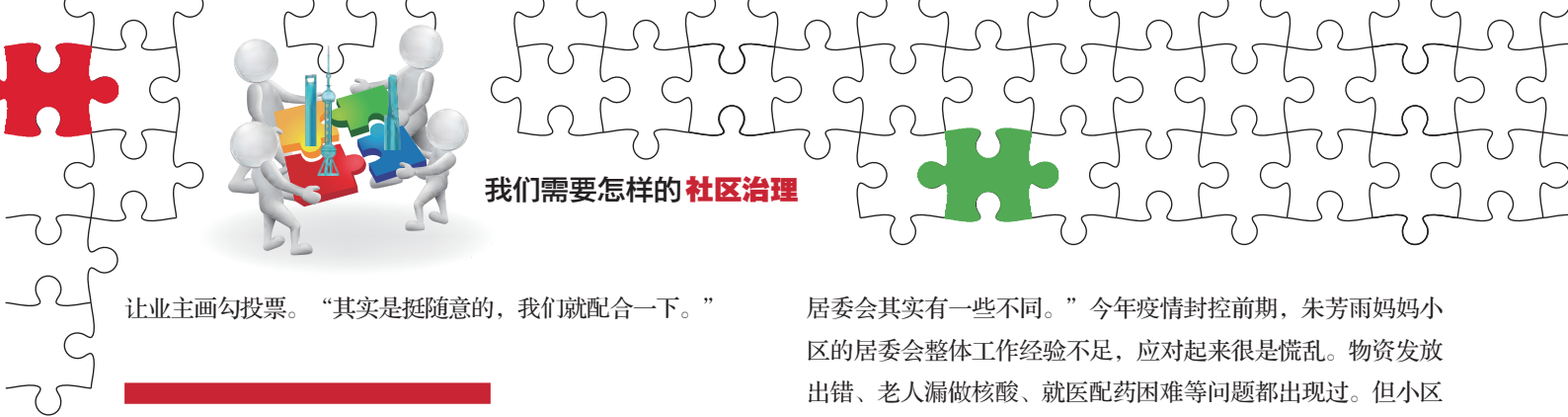




我们需要怎样的社区治理

让业主画勾投票。“其实是挺随意的，我们就配合一下。”

“蜕变”有因

3月底，福田区解封，4月初，封控在家多天的魏慕文准备去深圳最大的花展仙湖植物园花展逛一逛。而4月初，上海疫情正处于防控关键阶段。住在上海宝山区的朱芳雨心情很焦急。

原来是朱芳雨患有胸腺瘤的父亲已经持续发烧2周，因血氧饱和度过低只能卧床吸氧。这让朱芳雨一家子很是担心。经过多方沟通，朱芳雨了解就医流程后立即去居委会开了出门证。

“和居委会说明情况后，开出门证的速度很快。”拿到出门证的朱芳雨开车顺利带老人到医院做了多项检查，输液后老人病情慢慢好转。

疫情防控期间，上海居委会普遍任务繁重，人手短缺。朱芳雨所在的居委会需要负责两个小区，面对几千户居民，一天平均要接上百个电话。居委会的人整天忙得脚不沾地，没时间吃饭没时间睡觉，累了就睡在居委会办公室的桌子上地上。朱芳雨说：“居委会确实也不容易，特别是我们居委会成员人少负责范围大，居委会更多依靠物业公司和业主们凝聚一心，共同治理小区。”

今年，是朱芳雨搬进小区的第三年，小区的业委会还没有来得及成立，但这并不妨碍业主们参与到小区各项事务的治理中。朱芳雨所在小区的住户大多是“80后”和“90后”，防护意识特别高，干劲也很足。小区一栋楼有确诊阳性病例后，其他业主纷纷捐钱捐物为那一栋楼购买筹备防疫物品。除了物业公司聘请的第三方志愿者，小区一些热心业主也自发成为志愿者。每天搬运物资、敲门喊住户做核酸、疏通引导楼下人群，甚至还自发编写了《阳性楼栋防疫阻断手册》……

“我住在新小区，我妈妈住在一个老旧小区，两个小区的

居委会其实有一些不同。”今年疫情封控前期，朱芳雨妈妈小区的居委会整体工作经验不足，应对起来很是慌乱。物资发放出错、老人漏做核酸、就医配药困难等问题都出现过。但小区居委会成长得很快，连续几次失误后，陆续制定了具体的工作方案，使得整个小区治理变得清爽有序。完成“蜕变”的主要原因是小区居委会成员大多是刚加入居委会不久的年轻面孔。后期，这支经过打磨的居委会队伍还善于采纳居民意见，有事情就召集大家一起商量着办。比如为小区核酸亭选址时，一开始的计划是把核算亭建在小区外面的马路边。后来居委会听取居民意见，考虑到小区老年人偏多，就将核酸亭建在了小区里面。

可朱芳雨有时觉得自家的居委会如同一辆没有马的车——业主推一步，它走一步。朱芳雨家在靠近路边的那一排，因为路边没有设立噪声隔离带，即使关了窗户，偶尔夜里有大车经过时，朱芳雨也会被吵醒。有一天早晨起来，她甚至发现自家的一块玻璃被震裂开了。关于噪声治理问题，朱芳雨联合邻居多次和居委会进行了沟通，但是目前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居委会做着上传下达的工作，效率慢一点我们能理解，但是也不能太慢了。去问居委会问题解决到哪一步了，他们大多数时候都表示不太清楚。”对此，朱芳雨建议居委会应该多和业主沟通联系。

缘何不同

此次疫情，相当于一个大的社会实验，重新让人们思考现有的各种社区治理模式存在的不足。深圳建立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工作站和社区居委会“三社合署”的模式，实现对社区有效治理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居委会和业委会的职能，是否削弱了群众的自治能力？上海建立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三驾马车”模式，居委会需要承担较为繁重的任务。物业公司和业委会能否发力，还得看各自社区的具体情况。一旦

社区治理最基本的要义是共治共享。没有了“共”也就没有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管控治理的模式。